

《李自成》大悲剧

姚 雪 垠

一

我要讲题目叫做《李自成》大悲剧》。它是《李自成》这部小说的思想问题的总结，也是《李自成》从第三卷、第四卷到第五卷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把历史分析和小说情节合在一起来讲，遇着需要我分析历史的时候，我就加以分析，或者加以叙述，但有很多部分是小说情节，不能作为历史来看。因为《李自成》这部书是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反映历史，和一般历史书的性质是不同的。

《李自成》是一部篇幅较长的长篇小说。新出版的第三卷，分上、中、下三册，共九十六万多字，加上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约二百三十万字。下边还有第四卷和第五卷。作为一部小说来说，过去还没有这么长的，所以创作中遇到的难题特别多，我的工作量也特别繁重。我已经为《李自成》工作了多年，从动笔写就有二十四年，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遥远，全书才完成了三分之二！我好像一匹老马，拉着载重的马车，太阳已经西下了，还得艰难地向前赶路，不敢休息。我在北京住家，生活很象隐居。会议我不参加或极少参加，很少出去会朋友，看同志，将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部书的创作上。第四卷和第五卷现在正在口述录音，力争在一九八五年全部出版。我今天所谈的重点放在四、五两

卷，要牵涉到一些历史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全部来解释清楚，只能大体上谈一谈。

为什么写《李自成》？《李自成》这部书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包括的方面很多，我主要谈谈小说的主题思想。

写《李自成》这部书，是想通过这一次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力求反映历史事变的本质和规律，再现历史生活的原貌。即不仅写农民战争，就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武装力量同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明朝封建统治势力之间的生死斗争，还要写民族战争，就是以汉族为主的明朝政权和以满族为主的清朝政权之间的生死斗争。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第一卷一开始不是从李自成方面写起，而是从清兵进入北京附近、北京城戒严写起，我在开始写作时统观历史发展全局，考虑矛盾斗争性质的变化，要求在大的结构上首尾照应。小说写到第五卷后半部，崇祯亡国，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清兵进入北京，明朝的残余势力和农民起义力量之间的矛盾下降为从属的地位，而以满族为代表的清朝力量和汉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的地位。所以我决定这部长篇小说从满族武装力量进入北京周围写起，经过历史的曲折进程，最后以满族的统治中国大陆全部领土为终结，首尾照顾，结构完整。

这部小说的主要悲剧英雄是李自成，但是也写到张献忠的悲剧，也写到崇祯皇帝的悲剧，还写了其它许多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崇祯皇帝算不算悲剧人物，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可能有争议。但我是这么看的：崇祯皇帝和历代亡国之君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明末清朝有许多人是称赞他的，而更多的是同情他的，连他的敌人李自成进攻北京之前发布的檄文中也对他不完全否定，有一句话是“君非甚暗”。明朝亡国以后，人们在两百多年中，不仅地主阶级的读书人，也包括农民在内，对于崇祯皇帝的亡国怀着同情的居多数。当然农民缺乏文化，是受戏曲的影响；可是为什么地主阶级稍有知识的人同情崇祯皇帝的亡国？除反映在清朝统治下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之外，在他本人身上还有些什么道理？我

认为历史上同样是亡国之君，情况千差万别。历史上许多亡国之君，有的因为昏庸糊涂，荒淫无耻，不理朝政，亡国了；有的因为年幼无知，奸臣当道，亡国了。崇祯皇帝比起许多亡国之君来，他不昏庸，也不荒淫，不糊涂。他十七岁登基，一登基就把当时垄断朝政的大太监魏忠贤杀掉了，把他哥哥天启皇帝的乳母，即跟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那个客氏处死了。当时魏忠贤的党羽布满朝野，他该杀的杀，该贬的贬，该放逐的放逐。一天到晚起五更爬黄昏勤于治事，总想当一个中兴之主，英明皇帝，而结果被逼死煤山。所以这个人就他这个阶级来说，他是这个阶级里头的人材。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整个历史形势造成了明朝非亡国不可。我常想，明末假如不是他当皇帝，而是像万历、天启这样的人当皇帝，支撑不了十七年，可能早就亡国了，因此他也是个悲剧人物。但是大悲剧主要扮演者是李自成。

二

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冬天进入河南，十四年正月攻克洛阳，杀了福王，使明末打了十几年的农民战争起了一个重大变化。从这以后就变为以农民起义的武装力量——主要的以李自成为领导的农民武装力量居于优势，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明朝的力量逐步趋向崩溃。从崇祯十四年正月占领洛阳，到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被大水淹没为止，李自成不再流动作战，而以河南为舞台，一次一次大规模地消灭了明朝的重兵。最大的一次胜利是朱仙镇之战，一仗击溃了明朝十七万人马，获得了一次空前的胜利。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杀死了明朝两个总督（明朝的总督管几个省的兵力）：在河南襄城县杀死总督汪乔年，在项城县杀死另一个总督傅宗龙。三次大规模进攻开封，虽然不顺利，但是人马天天壮大，相传有五十万人马，我们打个五折计算，至少有二十五万能作战的部队，加上非作战人员大概近五十万。罗汝才也有略少于他的人马，跟他联合，奉他为主。两家合起来号称百万人马。这

样的局面不能说不算大。小说第三卷就是写这个发展。可是在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失败因素也逐渐滋长起来。

李自成因为第一次、第二次打开封都是强攻，没有打开，牺牲的将士很多，所以到了第三次围攻开封的时候，采取了围而不攻的办法，长时间把开封城包围起来。明朝官军十七万人马来救开封，到了朱仙镇，李自成就集中兵力消灭这十七万人马，用现在的军事词汇叫做“围城打援”。开封被围困了将近半年，城里大批饿死人，惨极了，一颗人头卖七钱银子，人吃人！最后官军从封丘坐船过河，在开封西北掘开了黄河南岸河堤，大水淹没了开封城，几十万人口的开封，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几万人，整个开封淹毁了。如今我们看开封破破烂烂，与崇祯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水淹开封，有密切关系。我们这次到开封看了相国寺。相国寺的大雄宝殿、八角琉璃殿都埋在地下一米多深。八角琉璃殿这次修整抬高了一米六。从前不知道，也没有注意，这一回修整才发现埋在地下一米六，主要是那次黄河发水把它淤起来的。清朝黄河也淹过开封，不象那次严重。李自成进攻开封的目的是想占领开封之后，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天下，然后第二步夺取明朝整个江山。开封淹毁了，占领开封的计划不能实现，就到了襄阳，把襄阳改为襄京，建立新顺政权，暂称为新顺王。他开始建立了较完整的文武官制，并且到处设官守土。在进北京之前，他几乎占领了半个中国：往南占领了湖南西北部一带，到了常德府境内；往东到了黄岗一带；往西到了现在青海的东部，占领了西宁；往东到了山东境内和苏北一部分地方；加上整个河南，整个陕西（当时的陕西包括现在的宁夏、甘肃和青海一部分）。

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十月间进入西安以后，决定以西安作为首都，改名长安，不再以北京作为首都。在西安临时以明朝的秦王宫为皇宫。于是大封功臣，公侯伯子男都封了，大行赏赐。这年十一月间回米脂县祭祖。李过率戎马万匹先回，修道路，修行宫。李自成在故乡大宴乡党父老，封官赏银，俨然大功已成。这

年十二月间，人马开始从韩城过黄河奔向北京。正月间，北伐主力军由他和刘宗敏率领，全部进入山西境内。除宁武一战外，沿路迎降，遂于三月十九日破了北京。经过四十天的光景，在山海关被清兵和吴三桂战败。从此节节失利，一蹶不振。第二年五月间，李自成随身的部队溃散，他逃到通山县九宫山下，被当地的地主武装杀死。

为什么开始发生那么大的号召力量，当崇祯十三年十月进入河南的时候，不过一千人马，几个月内发展到二、三十万人马，破了洛阳，扭转了明末的农民战争局面，完全握掌了军事上的主动权，而且继续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直到建都西安，几个月后破了北京，倾复了明朝。既然形势这么好，为什么进入北京后失败得那么快？

三

有人说，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因为部队腐化了，所以山海关一战打败仗，以后节节败退。能不能这样下结论？我们说，进入城市，个别部分有腐化现象或一定程度的腐化现象，但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北京的是少数，只有六七万人，绝大部分没有进北京。也许十分之八九没有到北京。纵然这少数部队腐化了，为什么不能以全力继续作战，转败为胜，或支持几年？可见李自成的败亡不是部队腐化问题，至少腐化不是主要因素。其次，在山海关作战的时候，李自成的部队战斗得非常顽强。如果一个部队已经腐化了，为什么还有顽强的战斗力？看来这说法不合实际。

第二个说法，刘宗敏进北京以后，到处抓人要钱，不给钱就用酷刑拷打。所以认为大顺军失败在刘宗敏要钱太多。这是不是个原因？我们说，有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也不能由刘宗敏负主要责任。大顺军从崇祯十三年冬天进入河南，提出了一个口号：“三年免征”、“随闯王，不纳粮”。“三年免征”，就是义军

占领的地方，三年内我不征粮；“随闯王，不纳粮”，就是跟随着闯王造反，不向官府纳粮。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李自成的部队后来发展很大，部队的给养从哪里来，军费政费依靠什么？打开洛阳，从福王府得到大批粮食和钱财，但是不能依靠这供养几十万人马，特别是在粮食方面。因此，虽说是“随闯王，不纳粮”、“三年免征”，实际大军的给养和他建立政权以后的开支，仍然出在老百姓身上。当然出法有所不同。有一个一贯行之有效的办法，这就是打击贪官污吏。到一个地方抓住贪官，或抓住有钱的劣绅，抄家要款项。是不是一般的中小地主也要受点连累？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李自成没有建立牢固的地方政权，也没有来得及恢复生产，几年中就是靠这种办法维持大军。进入北京后还是照旧行这种办法，对六品以上明朝官员一律追赃。原定对清官不追赃，实际做起来就过了线。这是大顺军的财政收入的一贯政策，早期是基本合理的，后期基本是有害的。进入北京后仍然执行这一政策，便欠缺策略性考虑，很不妥当。但这不是刘宗敏一个人的责任，他是执行大顺军中的政策。为什么由他来执行？因为这个人比较执法严厉，在大顺军中的威望仅仅低于李自成一个人，由他来执行比较能雷厉风行。所得到的银子没有下他自己的腰包，是作为大顺军的国库收入，由罗戴恩将军押运到西安的。有些历史著作，认为刘宗敏坏极了，首先这件事他要负大的责任。这是没有认真研究历史资料。

责备刘宗敏的第二件事，是认为刘宗敏不该把陈圆圆要去，激怒了吴三桂叛变降清。这又是在史料上没有作详细认真考察。首先从道理上就说不通，其次对文献资料是缺乏考究的。古人对于妻，非常看重，你要是把他的妻子夺去，认为是莫大的耻辱，这决不行；你要是把他的妾夺去，一般没有关系，妾是买的，有时还送朋友，封建社会规矩，古人说：爱妾可以换马。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都知道，如果丈夫死了，妻要守寡的，妾不要守寡，随时可以卖给别人。吴三桂少年得志，性格倜傥，喜欢结

交，挥金如土。假若刘宗敏要去陈圆圆确有其事，他会趁机同刘宗敏结个朋友，把爱妾送给刘宗敏。因为他的父母还住在北京，不会为一个妾来牺牲一家人的性命，也不会为一个妾就投降胡人（那时候对满族不认为是兄弟民族，叫“胡人”）。陈圆圆是一个江南苏州的妓女，崇祯十五年春天被田贵妃的父亲买到了，大概于崇祯十六年五月间被带到了北京。这一年的秋天（也许早一点）田贵妃的父亲病死了。吴三桂听说后，就让他住在北京的父亲把陈圆圆买去送到宁远（吴当时是镇守宁远的总兵官）。等到刘宗敏破北京，陈圆圆到宁远已经在半年以上了。这史料见于《国榷》，是出自吴襄之口，没有传奇色彩，故流传不广。我相信这一史料。从大顺政权方面说，吴三桂的态度是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大顺军进北京这一天，吴三桂到永平，以后短期驻军永平和玉田，举棋不定。随后决心与李自成为敌，退兵山海关。由于吴三桂对北京的威胁很大，迫使李自成一再推迟登极日期。到最后关头，李自成为要同吴三桂取得妥协，竟然同意将崇祯的太子交给吴三桂。假若吴三桂的反大顺是为着妓女陈圆圆，大顺政权将陈圆圆送给吴三桂不就好了？难道一个妓女比崇祯的太子的政治价值更高么？难道李自成和刘宗敏等人宁肯冒战败的极大风险而不肯放走一个妓女么？

有人说，李自成最后失败是因为杀了李岩。不应该杀这个人材，杀了以后河南的局面不可收拾了。这更缺乏历史根据。近四十年来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传得简直是家喻户晓。有没有这两个人呢？没有红娘子这个人，是铁板钉钉的。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没有红娘子这个人，你小说为什么写得这样生动呢？我写的是小说，我塑造的是艺术形象，来抒发我的思想感情。李信有没有这个人，问题很多。起码可以肯定：一、他不是杞县人，二、他不是举人，三、他不是李靖白的儿子，四、他在大顺军中的地位并不重要。首先第一个问题：清朝早期的《杞县志》否认有这个人。杞县属开封管辖，《开封府志》也否认有这个人。这怎么解释？也许

修志书的人不愿意把他留在志书上。那么看看当时当地人怎么说？杞县的邻县睢州有一个人名叫郑廉，他十几岁时也被李自成的部队虏去过，后来又放回来了，到了中年的时候他写了一部专记明天启六年到清顺治二年的河南民变的书——《豫变纪略》。他在书中否认曾经有李信这个人。他的理由是：他的家距杞县只有一百多里，他的亲戚故旧在杞县很多，从来没有人知道杞县有个李信改名李岩。他在李自成的部队中也没有听说有个李将军是杞县人。他还说当时杞县并没有一个举人是姓李的，只有一个叫刘诏的举人。他还说，只有一个宋知县，崇祯四年就调走了，野史说崇祯十三年破杞县杀宋知县根本没这回事。我们再查一查《杞县志》，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的大事记，根本没有红娘子破杞县救李岩这件事情。崇祯十二年杞县境内不但没有红娘子起义，连别的农民军也没有进攻过杞县。崇祯十三年，杞县境内没有来过农民军。崇祯十四年也没有。可见杞县当时并没有被任何农民军攻破城，更不必说红娘子了。查遍当时开封府的府志和开封附近各县县志，也没有红娘子的影子，就是说，红娘子曾经准备攻开封、又曾破杞县救李信，就根本没有影子。所以，红娘子是传说中的人物，李岩不是杞县人。其次，李岩不是举人。当时每一科乡试有一个“题名录”，全省各府、州、县凡是考中的举人，名字都在上面，而明末的每科乡试“题名录”都没有李信这个人。再次，说他是李精白的儿子，而李精白是兵部尚书。其实李精白根本不是河南人，而是安徽阜阳人。阜阳在明清时叫颍州，李精白是安徽颍州城内东门里边人。他也没有做过兵部尚书，而是做过山东巡抚，挂的中央官衔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老百姓把他家称为“都堂李家”。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名鹤孙，早年病死了；大儿子原名麟孙，改名李栩，曾经组织地主武装跟农民军作战。崇祯十五年九月间在颍州城东北王老人集被袁时中骗去赴宴杀掉了。李精白并没有一个儿子名叫李信，改名李岩。所以许多野史和《明史》说李信改名李岩，在李自成军中多么重要，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那么有没有一个人叫李信，或者叫李岩？可能有，情况不清楚，不能完全否定有这个人。作为历史科学，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一切结论和论断应该从证据出发。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要求，不能随意推测，妄下结论。所以有人认为杀李岩成为闯王很快失败的原因，是站不住脚的。连有没有李信这个人尚且搞不清楚，如何能说杀了他会影响大顺国的存亡！何况李自成在山海关一战失败后，地主武装到处反对他，河南已经到处叛变。假定确有一人本领很大，给他两万精兵到河南，他能不能收拾局面？决不能，因为当时作战条件和现在不大一样，如果全省当时的地主武装组织，都反对，显然对立面的兵力太强大了，两万人到河南就等于没入汪洋大海一样。以武器来说，双方差不多，都是弓箭刀矛，加上少数炮火。而小规模作战，以弓箭刀矛为主。在当时双方装备差不多的条件下，两万人进入河南，势必要被消灭在汪洋大海之中。何况，清兵很快就进入河南，这位“李岩”去河南更加不可能有什么作用。

上面这些说法都推翻了，那么李自成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快？这是李自成大悲剧的根源所在，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

四

李自成进入河南时，发展那么快，到处老百姓响应他，把他看成救星一样，是因为在以前他几次几乎被消灭了，处于非常艰苦卓绝的环境里，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血肉关系，和他的部下将士的关系也是非常亲密的。这一点，反对李自成的人，包括当时明朝朝廷的人都有共同印象。他的长处非常突出，不贪色，不爱财，脱粟粗粝，和部下同甘共苦。这些长处是很难得的。除此以外，他好读书，深谋远虑。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们说他“竟夜不眠，图画大事”。他还有一个长处：在召开会议的时候，自己很少发言，让别人尽量发言，等到别人讲完以后，他“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作为三百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应当说是具有光

辉的品质吧！有人问我为什么把李自成写得那么高，好像共产党员一样；还有人嘲笑我：“李自成在哪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呀？”其实，当时反对他的人，都肯定他有这么多长处，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如何能骂他呢？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历史的本来面貌所造成的误解。那么有人会说，既然这么好，那他为什么失败得那么快？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历史规律。一个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他的品质好，不能够保证他不失败。运动的成败，有它内在的规律。规律是各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个人的品质只是因素之一。成功有成功的规律，失败有失败的规律，个人的品质起一定作用，不起最后作用。譬如说，孙中山的品质非常好，很光辉，可是辛亥革命失败了。辛亥革命后他继续领导革命，都没有成功。可见优越的个人品质，不是成功与失败的最终的决定条件。一次革命运动(或战争)的成败的关键取决于许多因素，最主要的是敌对双方综合力量的强弱对比，斗争过程中的战略战术。最明显的成败因素是：革命派的政治路线和战略符合当时客观的形势需要，就会使革命发展、壮大、成功，违背了客观形势需要，就要失败，可能导致彻底失败。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常常是非常复杂的，我们现在简单谈一下李自成所犯的战略错误。

崇祯十六年五月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临时中央政权，讨论夺取全国政权的下一步用兵方略。有人建议从襄阳顺流东下，占领南京，以南京作为根据地，然后北伐。这个意见他不同意，认为太缓慢了。第二个提议，从襄阳出兵，穿过河南，过黄河直取北京。他也不同意，认为失之太急。他不同意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明朝还有孙传庭统率的部队在陕西关中地区。如果进攻北京不能迅速取胜，容易被孙传庭拦腰截断或从背后打他，使他进退失据。所以经黄河直趋北京是个险着。第三个建议是从襄阳出兵，攻战西安。关中地势险要，而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可以立为根本。然后从西安入山西，攻北京，比较稳妥。李自成同意了这一战略。这一年十月间进入西安，第二年正月进入山西，主力部队

出大同，经阳和、宣化，入居庸关，于三月十九日占领了北京。有些历史研究者认为这是伟大的战略，我看不见得。当时首要的大事是建立和巩固各地州、县政权，恢复生产，一则要有可靠的根据地，二则要满足人民乱久思治的迫切愿望。这是第一步，必须赶快做好。第二步，可以派部队过黄河占领太原，同时派部队开到山东截断运河。等山西、山东的局面稍稍稳定，然后进取北京。其实，只要截断运河，北京就会变成死城。因为明朝北京的粮食主要是靠大运河从南方运去的，如在山东截断大运河，绝了粮道，北京就很难维持。靠海道运粮，风浪大，容易翻船，只能解决一小部分粮食。应该用两年的时间把已占领的山东、河南、湖北、山东等省分都安定下来，做巩固政权的工作，叫老百姓喘口气，恢复生产，让他们知道新朝廷跟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这样做，纵然山海关打了败仗，各地还不会到处叛乱，还可以组织力量反攻。但是李自成没有这样做，而是一个战争接一个战争。老百姓在战乱中苦熬了十几年，仍没有恢复生产、休养生息的机会。李自成不仅不重视使百姓恢复生产，而且大军的给养还要从老百姓身上出。这样他就由刚进入河南时所采取的一些符合民心的措施，走向了反面，丧失了民心。过去我们有些写历史著作的同志害怕说李自成丧失民心，因为那样议论农民革命英雄必然会挨棍子，划为右派。但历史是一门科学，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不然就无法想像：为什么山海关一战失败了，河南是他活动最久的地方，而到处发生叛变？更不能想像：当他初到河南，对明朝统治者作战的时候，老百姓到处响应，应者如云，而当他跟清朝作战的时候，还有民族矛盾这样一个更有利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号召汉族广大人民群众跟“胡人”作战呢？症结就在于民心向背。民心背离，这是李自成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根本原因之下，作为战略方针，还有一个错误，就是李自成进北京带的人马太少。许多书上，包括明清正史《明史》和《清史稿》都说李自成到北京带领二十万人马。实际上没有这么

多，大概七、八万人马，也许不到八万。因为过黄河进军北京号称五十万人马，古人谈兵力都要夸大一倍，我们给打个折扣，算三十万人马。到临汾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刘芳亮率领，走晋南，过太行，从沁阳到安阳，由安阳北上，进攻保定。这是偏师，不是正师。这么一条线沿路过去总得有十万八万人马，沿途还要分散一些兵力。然后主力部队从临汾到太原。到太原后又分兵两路，少数的一支出娘子关，往保定跟刘芳亮会师，主力部队从太原北上，走忻州，出雁门关，到大同，由大同走阳和、宣化，进入居庸关，到了北京。沿路都要分散一些兵力。进到北京城下大概有七万人。兵力是太少了。

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战争，经过十六个年头，到进入北京的时候，看来是达到了胜利的顶峰，而实际也到了成败存亡的关头。他没有可靠的根据地，不象刘邦有汉中和关中以及陕洛作为后方，朱元璋有南京周围和江西、浙江一带地方作为依靠。没有可靠的根据地，支持战争所必需的财赋和兵源就极不可靠。立国基础的土地和人民，都是空的。他攻占北京是军事胜利么？实际是远离后方(陕西)，孤军深入，更深刻的说法是“悬军”深入。刘芳亮率领的偏师虽在保定，却不能对山海关决战有所帮助。看来李自成在十几年中不断打仗，却不明白当时的天下大势，不完全明白崇祯为什么在军事上失败，而他为什么胜利。特别严重的是，他不明白到北京以后，所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军事形势，他没料到会在远离后方的不利形势下被迫以孤军进行决战。他开始明白了这是一生事业的胜败存亡关头，然而形势迫使他不能不走向陷阱，走向失败。等他亲自率领六万人马往山海关去时，一切都晚了。

五

崇祯十三年以后，李自成不断取得胜利，终于进了北京，但不应该认为他的兵力绝对强大。因为崇祯皇帝自始至终都陷于对外和对内两面作战，无休止地消耗国力，从全局观察，他所处的

军事形势十分不利。这种形势给李自成造成了胜利的机会。单就关内局势看，各地农民起义，各家农民起义，尽管各自为谋。却在客观上起了互相呼应和互相支持的作用。所以李自成后期的胜利只能说明兵力相对强大，即在对崇祯作战的局部战场容易集中优势兵力。等到他占领了广大土地，又进了北京，兵力分散各地，面对着清兵和吴三桂关、宁精兵的联合大军，他的优势就不再有了。

李自成似乎不曾十分重视新兴的满洲力量，也没有料到他到了北京后必然要面对这支力量，并要同这支力量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方决战。现在我们简单地谈一谈满洲和吴三桂这两支敌对力量。

满族，从努尔哈赤开始脱离了明朝的羁縻，以十三甲起事，成为明朝边患。到了他的儿子皇太极（历史上称为清太宗），三十多年间力量扩充很大。对于这支力量应该怎样看？我是肯定他们的功劳的，特别是清太宗的功劳。努尔哈赤，尤其是清太宗，从明朝方面说，他们是生死敌人；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说，他们是杰出的英雄人物。到了清太宗这一代，完全把东北各部落统一起来，也将蒙古各部落统一起来，使满族由游牧为主的民族变为农耕为主的民族，由奴隶社会的末期进入封建社会，向汉族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大大地推动了我国东北地区的发展。

明朝的版图虽然远达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但是社会组织仍然是很分散的部落形式，这就影响了政治统治的不能稳定。努尔哈赤初期，东北以女真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分散为一个一个小部落，一城一寨都称为“国”，互相纷争、掠夺，非常落后。蒙古也是分散为一个一个部落，没有统一。从努尔哈赤开始就逐渐用武力统一东北，到清太宗皇太极把蒙古和东北各部落的势力统一到一起。在长城以外，北到外兴安岭，西到新疆、宁夏边境一带，全部统一了起来。从中华民族的整个利益来看，他们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英雄。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我国的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国家。在

清太宗时代很想恢复金朝盛世的局面，即想往南打到淮河流域，越过黄河，而在北京建都。他叫文臣把《金史》的《太宗本纪》翻译成满文，让满族贵族阅读。这个人很有本领，清朝入关前的开国规模是在他的手中建立起来的。他于崇祯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突然病死了，死时只有五十几岁。他死了以后，多尔袞把他六岁的小儿子福临（即顺治皇帝）扶上了皇位。当时满族皇族中也经过激烈斗争，我不用谈了。顺治的母亲就是《李自成》第三卷中写的那个长得很漂亮的给洪承畴送人参汤的满族贵妇人。当时摄政的并非多尔袞一人，可是多尔袞很快地排斥了别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多尔袞这个人也很了不起，十几岁带兵越过长城，进入河北境内，打到山东，二十九岁做了摄政王。他拿到政权以后，完全按照皇太极当时的战略，一心要进入长城，夺取北京。关于虎视眈眈的清朝情况，李自成如在梦中一样毫无警惕。对于李自成的这种状况我只有一个解释：胜利冲昏了头脑。大概李自成为清朝这股力量可以欺负明朝，不敢碰他李自成，所以他没有估计到这个真正的强敌会打进关来。

对待局势的变化，清朝方面很有准备，而大顺方面毫无准备。李自成在进军北京的战略上犯下的错误就是没有考虑到清兵可能入关，所以他带的人马不多。假若李自成有二十万精锐部队到北京，吴三桂可能不会叛降清朝。纵然战争不可避免，李自成有将近二十万人马投入决战，在山海关不会战败。山海关不战败，北京不会放弃。北京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政治城市，从辽到金、元、明都是以北京为首都。老百姓看北京到谁手里，谁就准得天下。轻易把北京丢掉了，老百姓认为你根本没有资格坐皇位，所以促成了各州、县纷纷叛变。李自成就没有把这复杂的环境和历史条件分析进去，只带了大约七万人马到北京，而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后援部队。这是战略上的一个大失策。

吴三桂这支部队，同沈阳的清政权既是作战的对手，又有复杂的社会联系。吴三桂的家，我称之为“关外武将世家”。他的父

亲吴襄是总兵官。他自己也年纪轻轻的当了总兵官。他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大多数是关外武将，特别是他的舅父祖大寿是很有名望的总兵官。祖大寿的兄弟祖大乐、祖大弼都是总兵官。总兵官是武一品，称为大帅。所以我称这个家族叫做“关外武将世家”。在洪承畴被清兵俘虏投降以后，祖大寿在锦州投降，大批将领跟着投降。吴三桂的亲舅舅祖大寿投降时，他的舅母左夫人仍住在吴三桂的宁远城里，其社会关系复杂得很。清太宗皇太极曾命已经降清的文臣武将，包括祖大寿、祖家兄弟、曾经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的同僚，和吴家有各种关系的人，都给吴三桂写信劝降。清太宗皇太极两次给吴三桂写信劝降。北京一度谣传吴三桂要投降清方，吴三桂为释崇祯之疑，让他的父母和一部分家人移居北京城内。所以崇祯亡国之后，吴三桂投降清朝，反对大顺，并不奇怪。倘若我们从吴三桂所代表的这一“关外武将世家”的社会关系、经济（财产）情况、清方从皇太极以来所执行的颇为有效的招降政策，以及当时的军事形势、阶级斗争特点、李自成和大顺军在北京暴露的弱点，等等许多方面作综合考察，便不难明白吴三桂降清的真正原因，而不会再相信是为了一个妓女陈圆圆。

关于吴三桂降清的详细原因和经过，留待讲山海关大战时再讲，我在这里不多谈了。总之，吴三桂由于种种原因，于崇祯十七年二月奉到崇祯的诏书后不能火速去救北京，耽误了时间，等他从山海关到了玉田县，北京已经破了，他就停兵在永平和玉田一代开始准备他自己的出路。他起初对李自成采取缓兵计，不说拒绝投降。等他知道清兵将要出动，决定要进入长城，就断然表示不向李自成投降，要报“君父之仇”。这时李自成的悲剧也就快开始了。这里我暂不谈李自成的悲剧，先谈崇祯皇帝的悲剧。

六

崇祯皇帝，我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来写的，他主观上老想做

明朝的中兴之主，想留名千古，而结果亡国亡得很惨。崇祯皇帝有种种必然失败的因素构成亡国的条件，这已在小说的前几卷里逐渐写出来了。他苦苦挣扎，终究不可能挽回他的历史命运，因此他是悲剧。但是如果有些方面他不那样做，也许他的江山还可以多维持些年。但事物是非常复杂的。正是因为他的许多行动、许多决策是错误的，也包括他性格上的一些特点，如不听别人劝告，刚愎自用，多疑，独断，残暴，等等，也加速了他的悲剧。关于这些，我今天就不作详细分析了。

以上是偏重在历史方面讲的，下面谈一谈我怎样根据历史的进程来写崇祯皇帝的悲剧，然后谈李自成的悲剧。

先谈崇祯皇帝。当大顺军到昌平的时候，崇祯还在假装镇静，在中左门召见考选官员，关于如何“安人心，戢狡谋，用兵足饷”等问题，这些官员们回答的非常不着边际。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太监在御案上放了一个小封子。他打开一看，上面面如土色，话也没说，起身回宫了。进士们怕他还要问话，不敢离开。过了好久，太监传旨，说：“皇帝已经不再问话了，你们就退出去吧。”怎么回事呢？原来刚才崇祯接到密报：李自成已经过居庸关，到达昌平了。

北京当时还有几万部队，崇祯就出动这几万部队在昌平和北京之间的沙河布阵，抵挡大顺军。率领部队的是襄城伯李国桢，是一个公子哥儿。看见大顺军来到，李国桢的部队不战自溃，所有大炮都丢了。大顺军又得了许多大炮，没经过战斗就到了北京城下。守城的太监们要为自己留后路，在大炮中只装火药，不装炮弹，守城的人很少，平均两个城垛有一个太监或一个老百姓。崇祯的国库空了，无钱守城，大概每天每人只发两个烧饼，吃不饱，有怨言。李自成派一个投降的监军太监名叫杜勋的进城来见崇祯皇帝，劝崇祯皇帝让位。但是杜勋到了崇祯面前，不敢说叫他完全让位，提出让他跟李自成平分江山。崇祯当时很恼火，把椅子踢倒了，但是没有杀这个太监。按说应该杀掉，因为太监不

管多么重要，都是皇帝的家奴，但是没杀。崇祯平时杀大臣毫不姑息，包括首辅大臣也处死过两个，对于总督、巡抚、总兵杀的就更多了。到现在连个太监都不能杀，可见他知道北京已经守不住啦。这个太监又出城了，到城头上他还跟守城的太监说：“我们不用怕。李王得了天下，仍然有我们的富贵在！”崇祯一向依靠太监，杜勋也是他重用的人，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如此。

当李自成开始过黄河向北京进军的时候，崇祯皇帝采取了几个紧急的救亡措施：一个紧急措施是大封武将。吴三桂在这个时候被封为平西伯，南方的左良玉、刘良佐、黄得功、刘泽清、高杰都加官进爵，而左良玉晋升为侯爵。第二个紧急措施是派太监监军。沿着大同、居庸关一线，派出亲信太监监军。杜勋正是在大同监军的太监，首先投降了大顺军。第三个紧急措施是派大学士李建泰往山西督师。李临走的时候，崇祯亲自率领太子和两个皇子永王、定王在午门楼上为李饯行。结果李建泰走到保定不敢前进了，后来在保定投降了大顺军。第四个紧急措施是崇祯下罪己诏，下了两次。

有两个重大对策在二月份进行了激烈争论，一是崇祯是否可以逃往南京，二是是否可以赶快调吴三桂救援北京。在崇祯的存亡关头，由于朝廷纷争，否决了南逃之议，耽误了调吴之策，对于崇祯的悲剧结局造成了无可改变的形势。

当时朝廷上有一部分大臣建议崇祯离开北京到南京去。明朝当时有两个京城：最早朱洪武建都南京，朱洪武死后他的孙子建文帝在南京坐了四年皇帝，被燕王朱棣篡位，就是明成祖。到永乐十八年的时候，北京城建成了，迁都北京。从此明朝始终就有两个京城。南京作为“留都”，也有六部衙门、都察院、国子监等机构和中央官员，不过真正掌权的官员是在北京。这时候有一些大臣建议请他到南京去。他起初也很动摇，想到南京去。可是有的大臣反对，以路途不安全为理由，认为不能离开北京。建议他逃往南京的大臣们看到这种情形，又建议护送太子先到南京去，

意思是如果北京被李自成攻破，太子在南京还可以继承明朝的皇统，不至亡国。结果又有人反对，他也不同意，只好全家留在北京。他抱着“国君死社稷”的思想，等着将来自尽了事。而反对他到南京去的那些臣工，当李自成进北京后却首先投降。

就军事形势说，崇祯当时逃往南京虽然有许多困难，但不是绝对走不通。崇祯也曾经下命令作准备，结果又取消了。为什么说可以走通呢？因为大顺军的主力部队是往太原走，如果从山东南下，崇祯是可以逃得及的。尽管也有李自成的部队进入山东，但人数很少，其中有些是明朝的将领新降大顺的。崇祯所经之处，必然会有许多人怀着各种目的起而勤王。刘泽清可以勤王，甚至新投降大顺的董学礼也可以“反正”。在封建时代，勤王不仅是君主的“美德”，而且是名正言顺的政治投机。一旦崇祯到了现在的江苏境内，驻在淮阴的明朝军队就可以迎接他。如果崇祯事先迅速下密诏通知南方，像史可法、高杰这些人会带着大军迅速北上迎接他。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第一，不能把李自成的兵力估计过大；第二，不能忽略封建社会各阶级在“国变”时常常出现的复杂的思想动态；第三，不要忽略驻扎在长江以北的武将们或者为着“君臣大义”，或者为着争取建立功勋，会争先恐后地出兵“迎驾”。

崇祯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就是从天津入海，绕过山东，在海州或别的地方登陆，虽然有风浪危险，但并非绝不可行。

南方基本上是完整的。倘若崇祯逃到南京，战争的发展必有很大曲折。也许清兵在华北同大顺军交战，而明军在淮北也同大顺军交战。种种变化，我不用推测了。

崇祯的真实思想是愿意逃走的。关于当时他的处境和复杂心理，将在小说中表现出来，今天不用详谈。北京内城将破的时候，他很想逃走，但是没有机会了。他有个妹夫叫巩永固，舅家表哥叫刘文炳，封新都侯。崇祯把巩永固和刘文炳召进宫去，对他们说：“我现在准备御驾亲征，你们可以把家丁点起来，随我

一起亲征。”我们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御驾亲征”的含意，古代“御驾亲征”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确实到前方指挥部队，一种是逃走也叫“御驾亲征”。巩永固一听就哭了，说：“皇上早该走没有走。我们祖宗的家法，皇亲驸马不能私养家丁。我纵然有家丁，人数很少，现在京城到处都是流贼，如何能保护御驾逃得出去呢！”他们相对哭了一阵，没有办法。可见如果有逃出北京的机会，他不是不想逃，只是在一个多月前由于一部分言官阻止，将他逃走的机会失去了。

关于崇祯此后的精神状态和失常行为，以及如何逼周后自尽，如何送太子和永王、定王出宫，如何在宫中杀人，包括砍伤他的长女长平公主，砍死他的小女儿昭仁公主，以及如何同太监王承恩吊死在煤山脚下的槐树枝上，等等故事细节，都将在小说中表现出来。我今天着重讲造成他的悲剧的各种历史条件（包括他的性格和作风），所以尽量省略了故事细节。

七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天明时候，北京内城的各门都由守城的太监头目和官员们自己打开了。首先进城的大顺军沿街传刘宗敏的安民晓谕，命百姓在门额上贴一“顺”字，便不杀人。百姓起初关门闭户，随后将大门打开，用黄纸或红纸写一“顺”字，贴于门额，有的还写着“永昌皇帝万岁”字样贴在门上，有的在门口摆设香案，有的在帽子上贴一“顺”字以便在街上行走。半晌时候，刘宗敏率领大约一千骑兵从正阳门进城，队伍整肃。正午时候，李自成在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等一班文臣陪同下由德胜门进城。最有地位的太监王德化、曹化淳率领一群大太监在德胜门恭迎。围攻北京的两天，李自成本来驻在阜城门外，为什么绕道从德胜门进城呢？这是因为，李自成不是战斗中冲杀进城，而是在破城后和平进城，因此，他应该从什么方向和什么时辰入城，都得由宋献策按照五行迷信的道理择定，以求趋吉避凶。有的书上

说他首先从西直门进城，忽然迎面来了一道黑气，宋猷策认为不吉利，临时改由德胜门入城。我认为从德胜门入城是事先决定的，上述说法不可信。如果是原来择定从西直门入城，为什么王德化，曹化淳等不在西直门恭迎？

李自成进皇城时没走西长安门，而是绕了一段路从大明门进。这是因为，大明门是正门，他是皇帝身份，当然应该从正门进来。许多书上说他到了承天门(清代改名天安门)前，弯弓搭箭，祝祷说：“倘若我有天下，就一箭射中‘天’字。”结果射中了一半，射在下方。宋猷策、牛金星赶快为他圆场，说了句：“虽然射了一半，也有一半江山！”这话不合理。因为当时李自成肯定自己要一统天下，决不会想到他有半个江山。而宋、牛二人也决不敢当着他的面说他只有一半天下。那么为什么要射这一箭？我看，如果他确实射过一箭，射这一箭的目的，是以胜利者皇帝身份，在进入被灭亡的朝廷皇宫时，要驱除邪气。

在李自成进城之前，已经有一队将士为他清宫，就是现在所说的安全搜查。他按照预定计划，住进武英殿。为什么不住进乾清宫？因为，第一，乾清宫是明朝亡国之君所住的宫院，是个不吉利的地方；第二，他只是在北京的皇宫中暂时驻蹕，并不把北京的皇宫看作他自己的皇宫。他已经决定在西安建都，将西安改名长安。因为李自成失败太快，来不及将北京改名。如果来得及，很可能将北京改名为幽州。何以知之？三月十五日北京收到刘宗敏的一道檄文，上边写明：“十八日幽州会同馆缴”，可知大顺方面已经决定将北京改名为幽州了。当李自成住在北京期间，北京被称为“行在”，表示是暂时驻蹕之地。由于轻视了北京在全国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价值，不打算久驻，也影响到战略和政治措施发生错误。

李自成到北京以后，最关心的大事有以下几项：一，赶快筹备登极大典。从本年正月初一日起，李自成已改年号为永昌元年，易服色，颁布避讳的字，重定官制，如今只剩下正式登极

了。所以到北京后就在百官中公布了《大顺礼制》和新的官制，择定四月初六登极(日期改动几次)，每日由鸿胪寺领导百官演礼。二，拷掠明臣追赃。三，招降吴三桂。四，对南方明朝武将招降。关于登极问题，新降明臣最为积极，不断上表劝进。但是由于对吴三桂的招降遇到波折，登极的事不能不一再推迟。吴三桂原来持观望态度，后来忽然回兵山海关，拒绝投降。关于吴三桂的态度变化和接着而来的山海关大战，我将在另一专题中去讲，这里只大概谈一下。

吴三桂屯兵永平一带，已经是进退失据。崇祯已死，大军粮饷没法解决，这情况使他不能不持观望态度。等到他摸清楚李自成来北京的人马只有数万，也没有后继部队，又知道李自成在北京拷掠追赃甚急，失去“人心”(特别是官绅富户)，可能也得到清兵在准备南来的消息，他的反李自成的主意就基本拿定了。恰恰他得到误传，说他的父亲吴襄也被拷掠，于是他的态度就完全决定了。但是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能打败李自成，所以他继续采取缓兵计，一面向清方求援，又按照多尔衮的指示，将李自成向山海关引诱，使大顺军陷入圈套。

清朝方面，得到李自成破了北京的确报后，就调集人马，打算从长城某口进入长城。多尔衮在路上得到吴三桂请求援兵的信，就直向山海关进军。四月十九日，大顺军到达山海关西边，次日开战。战场在石河西岸，距山海关数里。大顺军的兵力稍多于吴三桂的关、宁军，但是关、宁军是以逸待劳，有山海关作倚靠，城中百姓也参加助战。这一天战斗激烈，不分胜负，打了半日，至晚罢兵。

关于山海关之战，清初人所写的资料中有三点错误记述至今仍有影响，常被学术界同仁称引，在此顺便说明一下。第一，有的记载上说大战在一片石进行，这是不明地理的错误。长城在东端尽头处由北向南转，在山与海之间建筑临榆县城，城的东门就是山海关。一片石就是九门口，在山海关东北三十里处。开战的

当天，有唐通的部队一百多人从一片石出去，大概是刺探性质，被经过一片石边的清兵消灭，此后在这里没有战斗。第二，说大顺军投入大战的是二十万人，实际出北京的是六万人。以六万人说，不能不在永平留下一部分，所以投入战斗的大概是五万多人。第三，说大顺军将吴三桂包围起来，吴三桂突围出山海关去见多尔袞。实际上绝无此事。不仅李自成没兵力包围吴三桂，地理形势也是不可能的。吴三桂的布阵面向石河滩，战斗在石河滩和石河西岸进行。吴军的背后是临榆城(即山海关城)的西罗城。临榆城北边有一座北翼城，南边有一座南翼城，而南翼城南边是宁海城，接着是海边，名叫老龙头。吴军据有这样的地势，大顺军纵然再多许多，如何能够包围？在第一天大战激烈进行中，曾有大顺军数百人奔到西罗城旁边，被守城部队消灭。第二天大战时候，北翼城中有人起义，迎接大顺军少数人进去，迅速被消灭了。将来专讲山海关大战的题目时，我将要讲得具体一些，还要绘出一份草图。

当天晚上，清兵到了山海关城东的欢喜岭，多尔袞驻在威远堡。吴三桂率领几个将领和几个城中士绅去见多尔袞，向清朝投降，商量好第二天如何作战。清兵当夜大约有两万骑兵进入山海关城中。既然唐通的少数人马在一片石外遇到清兵，当然会很迅速报告李自成。李自成已经知道清兵来到，却不能从战场退走。大概他以为清兵只有少数来到，希望第二天同吴三桂进行决战，不等清兵大部来到就获得大捷。这是不明敌情，希望侥幸成功。所以李自成在山海关同敌人进行决战，不仅是犯了孤军深入的错误，而且犯了孤注一掷的错误。

第二天上午继续进行大战，主战场仍然在石河滩上，中心在石河西边的红瓦店，距山海关大约八里。大概由于知道清兵来到，李自成为防备陷于包围，从北山到海边都部署兵力。这样布阵是错误的，将本来不足的兵力分散太宽，没有纵深部署兵力，更没有保留充分的预备部队。大战进行了一半，忽然起了大风，

飞沙走石，使战斗暂时停顿。大风过后，重新厮杀，满洲骑兵出现，投入战斗。李自成的身边无兵投入战斗，明白战局已经不可挽回，只好策马向永平退走，并下令退兵。当时指挥大战的是刘宗敏，已经负了重伤。在大的混战中，撤退的命令不容易很快下达到每个指挥作战的将领。将士们不接到命令，只好继续死战不退。据说有七座营垒都被清兵和吴三桂的部队攻破。大顺军在退出战场后又被追杀了二十里，死伤十分惨重。

李自成在永平府停留了两天。看来清兵和吴三桂的关、宁部队也损失不小，需要补充整顿，所以没有一直追到永平。起初，吴三桂施了个缓兵计，即提出条件，要李自成将太子归还给他。这时，李自成派人去山海关见他，答应将太子给他，要求停止战斗。按逻辑推想，李自成的信中必然以民族大义激劝吴三桂，要他共同反满。但史料缺乏，小说中将写出这一内幕。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受封为平西王，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了。

李自成将吴襄杀死在永平西乡范家庄，带着残余人马奔回北京。大臣们“劝进”，李自成开始感到犹豫，说：“事情很紧，哪有工夫顾到这事！”刘宗敏考虑人心离散，厉声说：“若是不登极，就是想回到关中也不可得！”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极，牛金星代行郊天礼。二十八日五更，李自成逃离北京。五月初三日到了定州，被吴三桂的人马追上。谷可成指挥大顺军还兵拒战，战败阵亡。初四日，李自成亲自督兵还战，中了箭伤，伤势颇重，卧在民舍。百姓怨恨，携妻子逃走，夜间自焚庐舍，火光通天。大顺军一夕数惊，几次移营，只好赶快从固关退入山西。

山西、河北、山东、畿辅各地，听说李自成在山海关大败，丢掉北京，纷纷叛乱，使李自成在各地草草建立的地方政权迅速瓦解。李自成想守山西，已不可能，不得已从临汾渡过黄河，退到韩城，企图确保陕西。清兵（包括吴三桂）经过休整，分两路攻陕西。南路攻潼关，北路攻榆林，攻榆林的大军分一支南下攻

延安。李自成偕刘宗敏守潼关，无力出击，完全被动。知道延安失守，李自成赶快将守潼关的人马撤退到西安。几天后放弃西安，走蓝田山路，经商州逃往河南，又从河南邓州到襄阳。妇女老弱在蓝田到商州的路上遇着雨雪，死亡很多。在襄阳立脚不住，逃往武昌，又从武昌往九江逃。沿途受清兵追赶，发生过多 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总吃败仗。牛金星父子在离开襄阳后就逃走了。刘宗敏和宋献策在武昌一带被俘牺牲了。随后，连他的叔父、妃子也都被俘。他知道往九江去不行，折回头往湖南逃，被清兵打散，逃到九宫山，被乡勇杀死。他的溃散的部队分了几支。一支人数稍多，由郝摇旗率领，投降了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改称忠开营。田见秀和张鼐也是一支，答应投降清兵，但又犹豫，受到清军夜袭，他们在混战中死了。

总之，李自成到后来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被杀时似乎连一个卫士也不在身边，大概战马也没有了。这是进北京以后一年多的事情。这是他的大悲剧，然而并未结束。小说将提出许多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八

高夫人离开西安似乎同李自成分了路。李自成因为是仓卒退出西安，而榆林、宁夏、固原、兰州、汉中的部队都没法集中。后来这各处部队集合起来，由李过和高一功率领，高夫人在这支军中，由川陕边境退到湘鄂交界地方，也降了南明，称为忠贞营。几年之后，李过和高一功都死了，这支部队拥李来亨为首，到了鄂西兴山。郝摇旗、袁宗第、刘体纯等也辗转到了鄂西，继续抗清。十八年以后，他们经过长时间顽强战斗，才被消灭。李来亨当山寨被攻破时，全家自焚。这是全书的尾声。尾声三章打算提前发表，不详谈了。

（刘宣据姚雪垠同志一九八一年五月在郑州大学所作学术报告录音整理并经作者修改）